

漯河文史资料第四辑目录

- 1、一次难忘的会见——毛主席邀请我到
 中南海作客……………王英樵（1）
- 2、从延安到东北——四十年革命生涯回忆片断…王英樵（5）
- 3、刘少奇同志舞阳小庄一宿考……………舞阳县博物馆（30）
- 4、豫中地委、河南省委在舞阳……………刘志甲（33）
- 5、八年的回顾……………胡赞扬（35）
- 6、回忆在抗日挺进军第十五团的一段生活……………周声远（75）
- 7、大张突围……………朱 帆（86）
- 8、尹集战斗……………刘志甲（88）
- 9、建立在抗战胜利前夕的郾上西抗日民主政权…李 辉（93）
- 10、怀念革命先烈谷迁乔老师……………阎理之（98）

- 11、在冯玉祥身边的片断回忆……………张定宇（102）
- 12、爱国将军冯玉祥在舞阳的追忆……………李士凡（115）
- 13、冯玉祥将军在舞阳二三事……………阎书芳口述
 ……………范振江代笔（119）
- 14、漯河市民国年间军政大事记略……………马树奇（121）
- 15、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军在漯河投降经过……………马树奇（161）
- 16、五卅运动中的樊钟秀……………刘西森（165）
- 17、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舞阳的一次选举闹剧……………黄心一（174）
- 18、旧社会舞阳商民的一次抗捐斗争……………张止宇（180）

- 19、观看最后一次绞刑……………晁凌音(183)
- 20、旧社会的“没头贴子”……………钟去兵(185)
- 21、一百零三号……………钟去兵(178)

- 22、我也回忆我的老师曾次亮……………巩守志(188)
- 23、回忆郾城中学师范班……………王英樵(192)
- 24、解放前省立郾城中学在漯河……………葛文华等(195)
- 25、省立信阳师范《校风集》中的几首歌词……………周祖训(200)

- 26、中原地区古代民间风俗……………马树奇 阎稚丰辑(203)
- 27、乡土俗谚……………谭星白(228)
- 28、漯河地方的中元节——盂兰会……………张 哲(260)
- 29、童音多响亮……………晁凌音(262)
- 30、“盖河南”张秀卿……………王秉钧(267)
- 31、舞阳——越调之乡……………王秉钧(269)
- 32、漯河市沙河两岸的原始文化……………陆献瑞(272)
- 33、召陵宫当简介……………马树奇 孟巍坚(277)
- 34、历经八百余年的杨再兴墓……………范子文(279)
- 35、彼岸寺经幢和彼岸寺……………张汝鲤(287)
- 36、创修梅湾河堤石坝碑文……………朱帙供稿(293)
- 37、漯河东安市场三教九流……………张福祥(294)
- 38、说“信”字……………郑 临(301)

- 39、商榷·考订
 关于抗战胜利前后舞阳县党政机构的名称……………刘志甲(302)

一次难忘的会见——毛主席

邀请我到中南海作客

王英樵

1956年11月下旬，国家城市建设部召开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当时城市建设部长是万里同志。我在哈尔滨城市建设局任局长，去北京参加会议。临去北京之前，由我的岳母周陈轩老人（毛楚雄烈士的姥姥）、王淑兰同志（毛泽民同志的爱人，由湖南来哈尔滨作客），和我爱人周文楠她们三人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我过去在延安工作。现在毛主席的侄儿毛华初、侄女毛远志都跟我念书。这次趁我去北京开会，特寄此信并带去几斤马哈鱼（熏的），系东北兴凯湖特产，请他尝尝。如主席有时间，希望能予接见。到北京后，带的信和鱼送到王海蓉家，由海蓉的爷爷王季范老人转送中南海。王季范老人系主席的姨表兄，又是全国人大常委。偏偏王季老去海南岛视察去了，遂由王海蓉的母亲肖凤林同志转送中南海。

城市建设会议会期十天，十一月廿八日开始，十二月八日结束。信和东西送到中南海后没有回音，我以为毛主席操劳国家大事，宵衣旰食，日不暇给，不会接见了。那知八日白天会议结束，晚上毛主席即给王季老家去电话，说九日接我去中南海，到毛主席家作客。不巧，开完会以后，我和一道开会的同志出去

了，没有接到电话。待回到宾馆服务员告诉我有电话找时，我因没有接到电话而悔恨不已。九日上午，二次又来电话，结果我又不在宾馆。回来后得知情况，更是感到无限懊悔，恨自己不该出去。认为这么好的机会，不能亲自见到毛主席，以后也就更难有机会见到了。事情只有再一再二，那有再三再四。那知毛主席九日晚上第三次给王季老家又去电话，让转告我：十日上午十一时让我在宾馆等候，中南海有人去接。这次我终于亲自接到了电话，顿时感动得流下眼泪。十日上午十一时，毛主席的秘书坐着汽车到西郊宾馆来接了。在西郊宾馆等待的还有南京师范学院的熊教授。他是毛主席在长沙第一师范的同学，美国留学生。我们两个人上了车。从新华门进去，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处丰泽园。秘书让我们在会客室稍等，说主席有事，大约十五分钟就可出来接见你们了。秘书说毛主席的时间安排很紧，往往过了廿分钟就接见不上了。我们等有十几分钟，主席从会客室后边撩开挂的黑帐幔到了会客室。会客室的摆设简单朴素，靠后墙摆了一张长条几，两边摆了六张椅子，两头放了两盆君子兰花，大概是小型会议用的，另外靠西侧两角摆了两套沙发。主席看到我们，满脸笑容，亲切热情地握手后，让我们坐下，我们感到有些拘束，请主席先坐，他很幽默地说：“你们还都是些知识份子习气，坐下吧”。我们坐下后，主席首先向我询问我岳母周陈轩老人的情况，问身体情况怎么样，生活有困难没有？我说周外婆已七十六岁了，身体没人病，精神很好，我和周文楠只有一个女孩，工资也不低，没有什么困难。接着主席向熊教授介绍说：周陈轩外婆带着毛泽覃烈士的孩子毛楚雄，在韶山住了十多年。一九五〇年，他寄信给周文楠，才接往东北去的。老人抚养革命后代，费

尽了心血，生活很苦，在韶山人民群众中很有威望，韶山人民都称赞她是一位很好的老人。又问我在延安作什么工作，我说在“保小”当教员。毛主席笑着说：“那咱们还是同行哩，当年我也在长沙第一师范附小当老师，那是几十年以前的事了”。问罢我以后，接着问熊教授：“你是在美国留学的，在美国学什么？”熊教授说：“我在美国学的是资产阶级形式逻辑和哲学，”毛主席说：“我是搞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那咱们两个还是对立面呀”！开始谈话我们还有些拘谨，经过主席幽默和气的问话，顿然感到轻松而自然许多。接着毛主席谈道：“最近国际上在匈牙利发生了暴乱，对这一事件你们怎样看呀？”主席自问自答地说：“你们一定认为是坏事，我认为好事，因为坏事可以变好事嘛，我们可以借鉴，从中吸取教训么。”接着熊教授向主席提出了中国人口增长太快的问题，并建议说：应该提倡晚婚，修改婚姻法，因为建国初期婚姻规定结婚年龄是男廿女十八。这时主席笑着指向秘书说：“你问他同意不同意？他今年廿四岁已经结婚有小孩了”。熊教授接着说：“最好提倡晚婚，男的廿五六岁，女的廿三四岁结婚为好”。五十年代毛主席批判过马寅初的人口论，他是主张人口不受限制的，主席对人口问题没有接下去深谈。接着我说：“从哈尔滨来时给主席带了点东北的特产马哈鱼，不知主席看到没有？”主席问：“是不是日本向苏联提出的那种鱼呀？”我说“是的，另外给主席带了一本哈尔滨新修的儿童铁路画册，不知主席看到没有？”主席说：“看到了，这是全国第一条儿童铁路呀，你们是不是学习苏联的？”我说：“是的，是用林区牙克什作废的小铁路火车改造的。”接见约半个多小时，快十二点了，熊教授和我提出主席很忙，耽误了主席的宝贵时间，向主席

告辞，毛主席说：“不要走了，午间就在这里吃午饭。”紧接着秘书长叶子龙同志出来了，他说：“主席请你们在这里吃午饭、已经准备了，不要走了”。和主席一起去到会客室隔壁的一间小餐厅去吃饭，从会客室走出几步掀开墙上挂的黑布幔子就是小餐厅。熊教授我俩让主席坐里边的上座，主席无论如何不坐，他老人家不坐，我们也不好意思坐，在这十分为难的时候，叶子龙处长说话了：“你们是客人，主席让你们坐就坐下吧！”餐厅是向西方向，熊教授坐在里边（东），主席坐在左边（南），我坐在右边（北），叶处长坐在门口（西）。菜是四菜一汤，一碗辣椒，两盘水果（橘子、苹果），每人一杯葡萄酒。四个菜是：一碗红烧肉，一碗清蒸鱼、两碗素菜。饭是两样，大米饭和馒头。主席食欲很好，大块子肉和鱼，主席吃着很有味道。还不断地向我们让菜、让酒，给我们往碗里送菜。吃饭中间还问叶处长：“带的马哈鱼怎么没有吃呀”？叶处长说：“马哈鱼是咸的，是熏鱼，没有吃。饭后洗罢脸，我们请主席去休息，我们告辞了，主席送出会客室门外，秘书坐车又把我们送回宾馆。

这次难忘的会见，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多年，毛主席逝世也已经过去十三个年头了。抚今追昔，回忆往事，毛主席他老人家那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永远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王英樵，郾城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历任教导主任、校长、省教育厅督学、县长、省工业厅副厅长、哈尔滨市工业部长、建委主任等职。1983年离休）。

（本文编辑：马树奇）

从延安到东北——四十年

革命生涯回忆片断

王英樵

1932年暑假，我在郾城中学师范班毕业。同学们都有两个月的实习，我和同学胡位东免去实习，被校长常廉岑推荐到郾城第六高小五沟营去作教员。这个学校的校长常保一是常廉岑的哥哥。暑假前两个月我俩任课任教员，暑假后胡位东任教务主任我任训育主任，都兼任不同的课程，每月工薪十五元。第二年暑假前快放暑假的时候，经庶务主任透露说：作职员兼教员的每月工薪向县教育局呈报的是廿元，发给十五元，校长从中每月贪污五元。国难当头，一个青年到社会上想着能为国家和人民作点贡献，初到社会就受到贪官污吏的敲剥，实在令人愤怒不平。学期考试结束放假后，和同事张耿朗商量在他家的楼上写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常保一的标语，利用夜间天黑无人，就在学校院内和五沟营寨内大街上和四门上张贴出去。第二天大清早我就直去西平县乘火车到开封去了，原想到开封投考河南第一高师，因这个学校每月有五元公费补助，家中不花钱也可以节俭上学。当年招收两个班录取七十人，报考的四千余人，然果第一高师未被录取，另外考取了河南艺术师专学校。这个学校是自费，由于家中贫困无力供给继续上学，从此，就下决心作一个漂泊者自谋生

路。当时有个亲戚张和法在西安市任公安分局长，别的想不出办法，就去找他谋求职业。那时西安还不通火车。陇海铁路西段刚通到渭南，经渭南到临潼，徒步走了两天赶到西安，在亲戚家闲住两个月也找不到工作。一天我表叔张和法向我说，有一个机关要用文书，但必须是国民党员，问我是否国民党员？我说不是，他说填个国民党员登记表试试看，登记表也填了，文书的位置被他人挤占了，事情未成，在个人历史上还烙印了填国民党员登记表的污点。一个青年人住在亲戚家吃闲饭，心里实在过不去，总得有个生活出路。十月间公安总局招考新警，我报考被录取，分配到西安东大街公安一分局书记室帮助作缮写工作。冬天，公安总局新警训练班开学，让我去学习。一天上三次操讲四堂课，课堂上主要讲西安城市地理、违警罚法、交通规则、卫生规则、三民主义等。受训期间，正赶上杭州警官学校招生，限定高小文化程度，班上让我报名参加考试，考试结果，班上告诉录取，名列前茅，但三天后又告诉说不是陕西人不行。原来招考条件，并未限定非本地人不行，以后得知名额是被他人顶替了。当时训练班出刊有警钟壁报，我曾投稿写过“青年救国的责任”，被怀疑思想左倾，让我的亲戚对我提出注意。值此东北沦陷、华北危急、困难当头之际，一个热血青年连句爱国的话都不能说，真是令人悲痛欲绝。

1934年9月，我的亲戚的一位朋友，原杨虎城部的一个旅长曹国华被任命为陕北洛川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我的亲戚任副官主任，把我也带去了，作文书收发工作。洛川是陕北重镇，张学良的行辕和67军王以哲的军部都设在洛川。这里距延安不足二百里，只隔郿县和甘泉就到延安。洛川是陕北苏区的外围，从

军队缴获的宣传品中常可以看到红军的情况。专员公署秘书一位同事卫子人思想进步，常给我介绍一些进步书刊如上海出的《光明月刊》、《大众哲学》等让我看，对我的思想进步有很大帮助。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期间，专署停止办公，国民党县党部被取消，成立了抗日救亡群众指导委员会。这时卫子人我们二人直接到西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到西安后他被派到陇东地区工作，这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我在西安投考救亡运动训练班学习。不久，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被扣，东北将领67军军长王以哲被刺身亡，继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群众运动救亡训练班解散，从此，我和卫子人中断了联系。无奈，我即从西安返回郾城家乡。到家后，有杨店小学校长张光灼老师邀我去学校工作，任训育主任。1937年2月到校工作。在这期间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通过我表姊董秀英在漯河励行中学念书的关系，介绍认识了励行中学的同学谭西海、陆广治、罗芳清、罗秀清、陆秀芳等，乘星期天从杨店小学常去漯河和他们见面研究抗日救亡活动和学习方面的问题。当时国民党军队105师杨子恒部驻漯河，部队的政训处很反动。已处抗日战争的前夕，他们还镇压抗日救亡活动，实行白色恐怖，把励行中学的同学谭西海等逮捕了。我在学校工作也有人向我散风说，你要在地方工作，要保持饭碗，必须得参加国民党什么组织（大概是cc派），我坚决表示，我向来不愿在地方工作，更不愿参加国民党什么组织！由于政治环境恶劣，我即借故辞职于五月间离校。当时有杨虎城部独立十九旅驻防河南中牟县，有位朋友曹兴仁在旅部工作，我找他求职，被安排在旅司令部作书记。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在旅部编印抗战新闻。后因蒋介石为消灭异己，把军队进行改编，旅长沈玺亭名义

提为副师长，实际把军队四个团编散了，旅长成为空头司令。十月间我又回郾城家乡，被五沟营第六高小任教务主任的同学胡位东邀请到学校任教。平时上课，星期天带领高年级的学生到乡下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元旦学校放假，我去郾城看望同学。放假期间五沟营被土匪占了，学校陷于停顿。既然如此，不如远走高飞。我背着双亲，离开家乡，前往西安想去延安学习。

去西安想找卫子人，但打听不到他的消息。这时我的表妹董秀英在西安（她和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连长赵文斗结婚了），据她讲励行中学的同学罗芳清、罗秀清姊妹二人去了山西阎锡山办的民族革命大学、问我是否愿去？这时太原已经沦陷，民大已经迁往临汾。平时知道阎锡山是个老军阀，他办的民大情况复杂，听说托派头子张慕陶、叶青都在那里任教。阎锡山是借抗战之机收买青年扩充私人势力，不能去。临时在妹夫赵文斗的新兵连里作司务长兼文化教员。当时军队驻防风翔、岐山一带，平时除给新兵管理伙食，上文化课之外，还出去作些救亡宣传活动。二月间去的，五月间团部政训处提出，说我有左倾嫌疑，通过赵文斗对我提出警告。华北已经沦陷，国家、民族处于危亡之际，抗日救亡活动仍受限制，在这里醉生梦死何以为人！决定不干，先去西安再想办法前去延安。

奔赴延安

这时正巧有励行中学的同学罗芳清、罗秀清二人从山西给我表妹董秀英来了信说：她们已离开民大到了八路军随营学校学习，并说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正在招生。喜从天降，我立即离开部队前去西安。到西安后住在一家

旅馆里，经过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办理了投考陕北公学的手续。一天，在大街上遇上原在西安公安局训练班时的班长于俊声，在训练班时，他文化水平低，常让我帮他学文化，成为当时的挚友，有较深的感情。这时他从杭州警官学校毕业，已成一位警官，任派出所长。他很诚恳也坚决地非让我搬到他那里去住，我无法推脱，不得已搬到他那里住了三四晚上。谈论中他知道我要去延安学习，即向我进行反动宣传，说延安生活非常艰苦，吃小米、穿草鞋、没有工资、到那里受不了。现在抗日战争已经开始，在那里都是抗日救国，并说中央军校七分校和西北战干团都正在西安招生，七分校负责人严立棠是公安局训练班时的副队长，他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毕业生，他俩关系很好，他愿意写信让我免考进去。当时我在八路军办事处陕北公学招生委员会已经报名，正在考试。为了避免他的纠缠，我假意答应，中央军校我可以报名，不需要个人介绍，凭自己考试成绩，考取我去，考不取我不去。他知道我的为人，同意了我的意见。待陕公考试完毕录取后，临走的当天，我告诉他说今天我要走了。他说你去哪里？我明确告诉他，在八路军办事处已考取陕北公学，决定去延安学习。为了救国抗日，正需要在艰苦中锻炼，不为升官，不为发财，只希望对国家作个有用的人。过去几年，我的遭遇你是知道的，说到这里他掉了眼泪。看我意志坚决、无法说服，送给我廿元钱含泪分别了。到了八路军办事处，随同大家编队（一起走的有四十多人），背着行李（衣物和一条毯子），徒步起程，到关中旬邑县看花宫陕北公学分校去学习，从此，才算真正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陕北公学分校所在地旬邑县看花宫，距西安约三百多里路，

途经咸阳、泾阳、三原、耀县到旬邑，多系山区。沿途翻山越岭，完全是行军生活，每天行军七八十里路，走了五天，到了目的地陕北公学分校。陕公分校是从延安陕公总校分迁来的。我们是第一期，共三个队。编队从总校连续算起，编为29队、30队，31队（女生队），每队二百人左右。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还有港澳与南洋华侨。1938年春天，是国共两党统一战线高潮时期。西安是国共两党争夺青年的中心地。国民党在西安设有中央军校七分校和三青团的战干团。青年们根据自己的志愿，各寻自己的出路，有的留西安，有的去延安。当时有个很响亮的口号——青年的方向在延安。西安附近关中地区，共产党设有两个学校，一个是陕公分校，一个是三原安堡青训班（冯文彬任主任），和国民党的七分校与战干团遥遥相对。陕公分校的校长是罗迈（李维汉），教育长邵式平，政治部主任周纯全，都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名将。队长指导员是总校先期毕业的同学中选拔的，区队长和协理员也多是经过长征的知识份子。学生程度高低不同，有大学生、高中生、师范生、初中生，工人，个别的还有国外留学生。男女生分别编队。课程设置根据抗战的需要，设有中国问题，政治经济学，群众运动、游击战争、军事体育等。中国问题由原广东中山大学教授共产党员何干之讲授；政治经济学由从苏联回国的李培芝（王若飞的爱人）和李凡夫讲授，群众运动由邵式平教育长讲授，他和方志敏都是出名的群运领袖；游击战争由周纯全讲授；军事体育课由东北军的一个教官负责。上课没有教室，都是采取露天上大课的形式进行的。学校的校训是：“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生活和学习很紧张，但精神愉快。吃的是小米和白面馒头，因为这里属关中地区，是产小麦的地方，也产小

米，比延安地区要富裕一些。学生的服装，是各人穿自己原有的衣服，有学生装、有西服、有工装，女同志有穿旗袍的、裙子的、学生服的，什么都有，自己有啥穿啥，学校不限制。个别特殊困难的，学校给予救济补助。学习期间，学校号召同学们给亲友、同学写信，欢迎他们到陕公学校来学习。当时，我曾经给几位同学写信介绍情况，请他们出来学习，以后听说有郾城中学和师范班的同学曹世超、朱良才到三原安吴堡青训班学习一段，因身体不适应又回家乡了。陕公学校学习五个月毕业，并发了毕业证书。毕业后的去向由组织分配，大体上分为有去前方工作的，有去大后方工作的，有留校工作的，有去延安继续学习的。我决定去延安继续学习。十月间毕业，这时正是武汉失守，也是抗战后第一次反共高潮开始。从此，全国各地去延安的青年开始受阻，西行已没有自由，有的被扣，送往国民党战干团，有的送往集中营。我们四五十人是从陕公分校直接去延安的，完全在陕甘宁边区根据地范围，约八百里路全是山区，翻山涉水，穿越高原，经过十多天到了延安。当时心中有无法言表的高兴！延安是革命的心脏，是革命圣地，是党中央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是根据地的大后方。抗战初期，延安的学校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组部训练班。以后增设有中央党校、自然科学学院，女大（以后改为延安大学），行政学院，医科大学，新文字干部学校，边区中学，保育小学等。我到延安后继续在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当时研究班有两个队，每队约二百人，我被编在第二队，总校校长成仿吾，教育长江隆基，课程设有社会科学、哲学、联共党史、中国现代革命史等。教授都是中央领导机关的同志，哲学是艾思奇、陈唯实讲，联共党史是陈昌浩讲

(当时中文版还未出版，陈昌浩精通俄语，是按俄文原版讲的)、社会科学是徐冰讲，中国近代史是杨松和吴亮平讲。有时毛主席、陈云、李富春也去作报告。我们是十月下旬到总校开始学习的，到校不久，有九架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当时延安城内很繁华，又是星期天，飞机轰炸形成一片混乱，不过商店都设在靠西山的窑洞附近，所以人员伤亡不大，城内房子多被炸毁了。陕公总校是在延安北门外半山坡的窑洞里居住，飞机轰炸那天，有许多同学到城内玩去了。我因刚到延安，在已是十月底的深秋天气还没有棉衣，正在把买了的一斤棉花用单上衣和衬衣自己在校缝制棉袄，没有到城内受到飞机轰炸的惊吓。

延安的生活，比陕公分校要艰苦些，因为陕公分校地处关中，是产小麦地区，天天可以吃到馒头。延安附近各县，都是生产谷子和包米，所以经常多是吃小米，每星期才能吃到一次馒头，有点带肉的菜就算是改善伙食会餐了。平常小米饭的锅巴都抢着吃，感到吃着很香，很有味道，大家都把它叫列宁饼干。每个月每人有一元钱的津贴。那时东西便宜，一元钱到小饭馆可以炒三个菜。一发津贴，到吃饭时候大家端着小米饭就到饭馆买炒菜去了，互相请吃，非常有意思。当时我们队有两个同学是南洋华侨，他们家中寄钱来就让他们请客，到馆子炒几个菜大家饱餐一顿。学生是男女同队，分住在窑洞里。每个窑洞有一铺炕，一个炕上睡七八个人，拥挤的翻身都困难。大家来自天南海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不分彼此，亲如手足，真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个人的生活用具很简单，一个搪瓷缸子可以多种用途，冬天拴在腰间的皮带上，早晨到延河之滨去洗脸可以作脸盆，可以作漱口杯，吃饭时可以作饭碗，可以

作菜盆，喝水时可以作茶杯，生活简单愉快，作风紧张活泼。回忆起来，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最有生气，最幸福也最有意义的一段生活，永远留恋难忘。

1939年2月，学习期满毕业，工作由中央组织部统一分配。我和鄠城中学时的老师孙敬毅同志等几个人由于过去教过书，中组部都介绍到边区政府教育厅。当时教育厅长是周扬同志，经他亲切谈话，介绍工作情况，说保育院小学部急需教员，并说保小是干部子弟学校，因为统一战线的关系，对边区以外叫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部，这样就可以从重庆宋庆龄主持的全国保育总会领到一部分经费，所以叫保小不叫干部子弟学校。随后，教育厅通知保小来人带着牲口，拖着我们的行李到距延安八十里路的安塞白家坪保小去工作了。

“园丁”三年

后来我知道保小成立于1937年，当时叫鲁迅小学。最初，校长是教育部长徐特立兼任。1938年改为边区师范附小，开始，只有几十人，以后有一百多人，1939年二月搬到安塞白家坪时已有三百多人，行政领导为边区政府教育厅。中组部、西北局，中央妇委对学校都很关心，经常过问。学生来自四方八方，有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如毛主席的侄儿毛华初、侄女毛远志，刘少奇同志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项英同志的女儿项苏云，肖勋光同志的儿子肖永定，方志敏烈士的儿子方荣柏、方荣竹，刘志丹烈士的女儿刘素贞，刘志坚烈士的儿子刘虎生，李维汉同志的儿子李铁映、丁玲的儿子蒋祖林、女儿蒋祖慧等以及地方干部县以上领导的子女，军队团以上干部的子女和父母在敌后或国民党统

治区地下工作同志的子女，烈士子女，也有朝鲜干部的子女都有在这里学习的。这几百个孩子男女大体各半，他们的年龄悬殊很大，最大的十七八岁（过去没机会念书），最小的七八岁，但大家都能和睦相处、团结互助、相亲相爱，情同手足，同生活、同玩耍、同学习、形成一个幸福的乐园。

白家坪，是山口外的一个小村庄。有一批原来地主留下的石窑洞，又打了一部分新窑洞，背后靠山，门前临道。这时保小的校长是郭青同志，抗战前他在陶行知办的淮安学校工作。生活指导主任兼学校支部书记是彭镜秋（女）同志，她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抗战后从南京监狱释放出来。总务主任刘坤模（女），是彭德怀原配夫人。我任教务主任。四〇年以后，教务、教导合一改为教导主任，我在这个学校工作了三年，担任两年半教导主任、半年校长。

当时保小教职员工近百人，学生三百多人。教职员工的情况，从革命经历来看，有1925年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他们在白色恐怖中出生入死，久经考验，如彭镜秋、孙敬毅、宋思纯、周文楠几位女同志。有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和陕北土地革命与敌人作殊死斗争的如罗冬祥、谢肇通、贺吉树、梁加业、肖义贵等同志。有新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大批爱国青年知识分子。这些同志，有抗大毕业的、陕公毕业的、鲁艺毕业的、女大毕业的、马列学院毕业的、中组部训练班毕业的、青干校毕业的。从他们原来的学历看，有大学生、有师范生、有高中生、有的过去做过教育工作，有的没有做过教育工作。总务和保育工作人员，多是文盲半文盲，或者念过小学。教职员工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来自白山黑水的东三省，有的来自南洋群岛的爱国华侨，有的来

自黄河和长江各省市。他们的民族有汉族、满族、蒙族、朝鲜族等。他们民族不同，学历不同，经历不同，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打日本救中国，最终实现人类的理想共产主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把大家团结在一个革命大家庭中来了。学校的生活也是艰苦的，师生都是供给制。教职员与学生所不同的每月有三元钱的津贴。当时毛主席、朱总司令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过是五元钱津贴。学校伙食师生都是一样，大家一起吃饭。教职员工认真学习，积极工作，热爱学生。教师们的任务是双重的，既要教学生文化和科学知识，又要负责生活管理，既教书又育人，既当老师，又当学生，处处可以学习并得到锻炼，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大熔炉，革命的大家庭。

学校实行供给制，衣食住全部公家负责，每人每年发灰布单衣一套，白布短袖衬衣，灰短裤两套，草鞋棉鞋各一双，冬天发自制白布袜子一双，每月一元津贴。孩子们穿衣服费，破了补，补了破，缝缝补补倒无所谓，可鞋子坏了是很难办的，不管大小每人都知道省鞋穿，有人找同学打草鞋，有的同学干脆在热天打光脚板，把鞋省下来在最需要的时候穿。

同学们铺盖条件都很差，小而单薄，学校有种互相友爱的好制度，就是把大同学和小同学搭配开，给每个小同学都分一个大哥哥、大姐姐，这个小弟弟小妹妹的一切生活琐事都由大哥哥大姐姐照料。有的没有被子，分配住房时大的和小的分到一个窑洞里合盖被子。当时学校的经济条件有限，不能给每个同学解决被褥，只能重点解决或者个别补助一部分。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大同学帮小同学是很好的校风。

吃饭军事化。吃饭阵势很有趣，有浓厚的兵营色彩，开饭前